



引用格式:徐瑞坤,徐宗华.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分层考异[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89-94.

中图分类号:D73;D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89-06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分层考异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徐瑞坤¹,徐宗华²

XU Ruikun, XU Zonghua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政治文化分为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在国家层面上的差异表现为:中国大一统的皇权专制与西方的分权制衡和民主的区别;在社会层面上的差异表现为:中国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宗法伦理精神与西方独立的公民社会、基督教宗教精神统治的区别;在公民层面上的差异表现为:中国宗法伦理为主要价值观念的臣民、子民型的公民文化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参与型的公民文化的区别。我们既不能僵硬地坚持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文化,而是应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现代性开掘,做到古为今用;合理吸收西方政治文化的先进成分,做到洋为中用。惟有如此,才能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乃至超前的新型的政治文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关键词:

中国;
西方;
传统政治文化;
分层

[收稿日期]2019-01-29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7FZZ005,2017BZZ009);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8-ZZJH-606)

[作者简介]徐瑞坤(1995—),男,河南省平顶山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西政治文化比较;徐宗华(1965—),男,河南省夏邑县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文化比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政治文化是文化的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民族深层次的精神追求,蕴含着国民最根本的政治思想基因,深藏着民族最丰富的政治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自信”思想,从社会结构视角分层考察其差异,目的亦然。

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由政治认识、政治感情、政治理论、政治价值观念构成的有机体系^{[2]8}。自从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以来,潜心研究中国和西方(指典型的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传统政治文化差异者甚众,特别是近现代,所形成的成果不胜枚举。但是从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逻辑去分层比较中西政治文化者较为少见,研究思考政治文化传统差异与现代政治体系延续性之关系的文章也很少见。鉴于此,本文拟从国家、社会、公民这三个层面,去梳理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分析二者的差异对当代中西政治体系的基因性影响,以提升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觉。

一、政治文化的分层

政治文化是潜在的,内涵是复杂的,国内外学界对其理解也有诸多差异;政治文化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其影响和功能,很难评定,也不好数字来量化,即使有些指标量化了,作了统计分析,鉴于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

我们认为,把结构功能学派的分类方法与中国人分析社会结构的逻辑习惯结合起来,也许更有利于国人理解政治文化的逻辑结构。政治文化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以国家权力组织运营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文化,包括国家观念、国家

组织权力指导理论、集权与分权、国家领导力量、国体、政体等层面所反映的政治文化,称之为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二是以协调、运转与沟通国家和个人政治文化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参与方式、社会调节方式和公民社会活动模式等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层面的政治文化;三是公民独立存在并通过社会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政治活动和思想倾向,称之为公民层面的政治文化。这种分层在习惯上源于中国人在政治活动中常常排列的国家、社会(集体)、个人的思路与逻辑。

在政治学上,国家就是公共权力的获得、掌管与运作的过程。反映国家权力组织运行目标和指导思想的综合文化,往往是这个国家的上层政治文化或主流政治文化。上层政治文化通过世俗化作用于社会,使人们(公民)在社会中获得传导、传播、同化、异化或分化。而公民个人、集体(更多是团体、群体)的政治思想、态度、理论等,在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得到修改、矫正、丰富和发展,再通过一定的表达机制,如集会、结社、出版、传播等途径,反馈到国家权力体系中,这一作用过程往往是同时的、复杂的、多向的。在这里,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这三个层面的政治文化既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不能割裂开来。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对政治文化进行细化研究时可以将各个层面进行分解,以便深入剖析;而在进行宏观分析时又不能将它们孤立开来,否则,就是形而上学。

二、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

运用以上分层分类的方法可以发现,在传统政治文化上,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是明显的。

1. 国家层面上的传统政治文化差异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在国家层面上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国家观念不同。中国人认为“家国同构”。国最早是分封给诸侯的领地,这些诸侯

认为国就是自家的国,往往以姓氏或地名来命名,所以史上就有齐国、赵国、魏国等。家则是卿、大夫的采邑,其中的臣民全都以“家”相称,如家奴、家丁等,而整个天下则都是属于天子的。秦统一六国后,国君一统天下称为“皇帝”“天子”,天子受命于天,管理统治国家,臣民则“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玉杯》)。于是,天子统管天下、皇帝代表国家的观念就逐渐形成了,君和国一体,国和家一体;国家是皇帝的国家,天下是皇家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壮山》)。通常人们所说的汉是刘家的天下、唐是李家的天下、宋是赵家的天下,即由此而来。这样,皇帝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就是家长和家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将其概括成父子关系,天子是最大的家长,正所谓“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盐铁论·备胡》)、“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私物”(《明夷待访录·原臣》)。虽然,后来的国家观念逐步演化为国家是统治者、国民、国土、管制机器(军队、警察等)组成的系统,形成了现在统一的、整体的、不同性质的由主权、领土和人民构成的一般的国家观念,但我国“家国同构”的传统政治文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下来并影响着现代社会,如当今某县、某市主要领导讲话常用“我代表某市(县)政府和全市(县)人民”之语,而百姓有时仍称地方官员(乡长、县长)为“父母官”等。

西方的国家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城市,那时的国家就是指公民的联合体。例如,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看作若干家庭和村落组成的联合体;国家不是某一家的,而是“公家”的。到了近代社会,卢梭等社会契约论者认为,国家就是国民让渡部分权利订立契约而形成的联合体。例如,美国独立建立国家时,13个殖民地互不熟悉,是“依据公约或协议组织起来的自治团体”^[3]。以致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H·怀特说:“美国是由观念产生的国家,体制是人有意

地创造出来的,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4]

这种不同的国家观念缔造了不同的国家权力观。中国人认为,治国权力来源于天,“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所以政出君王天子一人,“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记》),权力结构是宝塔形,皇帝居于这个宝塔的最顶尖,“号令天下,统率万民”。而西方的国家权力观认为,国家的权力来源于自然法,来源于人民的让渡。尽管在西方自然权利观中,社会契约论从伊壁鸠鲁到卢梭,中间经霍布斯、洛克等人各自的阐释,理论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认为,国家是公众通过订立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公众的联合,不是个人的国家,权力也不是个人的,而是公众的;公众将权力委托给执政者,执政者要按照公众的意志去行使权力、管理国家。

国家观念的思想价值基础不同,导致权力掌管者和权力的运作方式也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天子”一人当权,权力运作当然是高度集中的,集权于一人,整个国家机器都成了皇帝权力运行的工具。所以,我国自古就有“国不堪贰,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也”(《荀子·致士》)、“一则治,两则乱”,“一则治,异则乱”(《吕氏春秋·执一》)等说法。地方官吏的设置任命都是由皇帝说了算,地方对中央绝对服从,权力运作方向是单向的。加上君臣之忠的礼治思想为之提供道德辅助,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得以长期维持。到汉代,统治者认为,社会价值观即现代所说的主流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的思想也要一统,出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繁露·王道》)。这种一统体制进一步表现为权力归一、思想一统、国土一统、民族统一,国家与社会“以一贯之”,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权力监督方面,中国对皇权的制约和监督主要靠道德、礼仪等内在约束,如“德不配

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国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等。虽然也有“民贵君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说法,但是这种外在监督的效果是非常微弱的,其日常有效性主要依赖于最高统治者的自觉、自愿。

西方政治文化则认为,权力来源于公众的让渡。天赋人权于公众的每个人,形成以天为公的“公天下”,人们可以把自己的权力委托给不同的人,人选不是唯一的,权力运作也不是单向的,多数时候,为了能让受托者更好地为公众服务,防止专权,就设法分权、制权、限权,权力运作是并列的、平行的、多元的。西方社会从古到今都是实行多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神学统治和君主专制时代,人们就是以恢复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之名义对统治者进行斗争的。雅典时期,执政官有9位,将军则有10名,还有元老院、五百人议事会、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等。古罗马更是多元主义的典型^{[2]96},高级职位往往都由多人平行担任,这也是罗马共和精神的一个集中体现。即使在罗马帝国时期,也出现过“四帝共制”的状况。基于此,近代西方,人们主要把国家看成维护个人权利的工具,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他们逐步创立完善了分权、制约的思想。他们认为,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三权合一就意味着专制。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如果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合为一体,则一切便都完了。”^[5]

2. 社会层面上的传统政治文化差异

社会层面上的政治文化比较复杂、宽泛,因为人们对“社会”这一概念有多种理解。中国人对社会的理解,通常是自然地理上相对独立的人群系统,强烈共同的某一特征的群体,以及物质条件相同的人群。一般认为,社会是指同一国家制度下的人群整体。“社会结构”一词,也是百人百解。在西方,“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包括多重内容,可以是人口统计上的基本划分

与主要资源,如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分布,也可以是带有历史烙印的社会制度体系,或基本制度体系。我们倾向于后一种含义,这些复杂性使得我们只能在设定的范围内比较其政治文化。

中国是一个世俗社会,没有一个能够称得上宗教的体系,儒、佛、道、法等在中国都没有产生过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作用。儒家思想,汉代以后被作为国家唯一的正统思想,它追求的是现世不是来世,是人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没有多少神秘不可知的色彩,也没有人格化的宗教偶像,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是有血有肉、有自身性格、有悲痛欢乐的现实中的。人们信仰儒教,也不需要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儒家的“礼”是世俗化的。佛教在中国的影响也比较有限,其教义被中国人改造以后,虽其依然是来世哲学,但与世俗政治相关性不大,它是以退出政治方式来影响和服务于政治的。而道教则追求神仙境界和长生不死,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主流意识中有超世和厌世现象。林语堂先生曾说,“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挫败时刻是道家”^[7],或成为佛家。当他们做大儒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时,才转而由“成圣”到“成仙成佛”以达到“功名利禄转头空”的境界。总之,儒、道、佛三教并没有成为对抗专制皇权的力量,只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儒学更成为直接维护皇权的思想体系。与西方统一的基督教组织与王权专制抗衡的态势相比,中国这种高度专制一统的世俗王权和分散不成气候、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使得中国社会少了多元化的色彩,多了皇权一元化统治的世俗色彩和宗教伦理相对单一的社会氛围。以此为背景,中国社会的国家权力的组织方式是一元的、专制的,社会关系是明确的、等级的、宗法的、伦理的道德制约体系。

西方社会的价值精神受中世纪的影响是极大的,形成了宗教精神至上的社会传统。马克

斯·韦伯认为,基督教节俭勤劳、团队生活等精神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始雏形。历史上,西方基督教的神学专制、上帝崇拜、宗教仪式等,都对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基督教取得政治权力后,皇权和教权合一,清除异教徒,维护正统教义,使得整个中世纪形成了一个上帝、一部圣书、一个教廷、一个至高无上的教皇的社会格局。宗教利用教权和政权对异端进行残酷迫害,导致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中世纪后,当皇权过于强大时,人们又以教会为依托,向皇权专制抗争,新教伦理中自由平等的思想成为人们与皇权斗争的庇护,最终限制了皇权的无限性。这种政教二元的社会结构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左右逢源的资源。一方面,西方社会生活大多在宗教团体里进行,可以用教会组织制约专制王权,教会成为与专制王权斗争的武器;另一方面,以自然权利观恢复人性、张扬人的权利,用世俗权力来摧毁宗教专制。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使教权、王权相互制约、不断进化,从而为资本主义分权、制权提供了最初的、最强大政治体制的先例。

在中国,人赖以活动的群体是家庭,几世同堂而居,财产是夫妇共有,乃至几代人或宗亲共有,家庭宗族是中国人活动的基本单元。而西方人的社会活动往往是基于宗教组织、独立的社团,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主要是受宗教规章和国家法律制度调节。梁漱溟先生曾精辟地总结道:在天下(国家)、社会团体、家庭、个人序列中,中国人看重天下和家庭,而西方人则看重团体和个人;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讲情理、讲情面,而西方人讲法律、纪律,不讲情面;中国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活动的、软性的,而西方是硬性的、机械的^[8]。

在中国,1840年后仍是专制的王权。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是“礼”,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是道德和伦理。而在西方,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是宗教精神、法律制度,主要是法。在

西方,社会组织方式是多元的。天主教、新教等不同教派的信徒,在近代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后秉持了明显的民主平等理念。

由此可见,中西政治文化在社会治理和社会调节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中国,社会治理主要是基于道德、伦理、宗法(实质也是道德伦理),即所谓的“德治”“礼治”;社会关系是柔性的,连接人的纽带主要是以家庭为单元的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是亲情社会、人情社会;这种治理是温和的、可逆的,社会是稳定的、和谐的,不会因为很小的事情都诉诸法律。而西方社会治理则主要是基于法律,这是西方的传统,人们主要是在法律、制度基础上活动,社会关系是刚性的,人的个体独立性较强,人情亲情比较淡漠。基于此,中国最基层民众的价值追求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原始的集体主义,知识分子和正义的官僚阶层(士和仕)的社会追求是和谐社会和“天下大同”;而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则是西方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3. 公民层面上的传统政治文化差异

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在公民层面上也有明显的不同。中国的民众在传统上是受约束的、不自由的,是依附的、等级的,是受宗法制度和伦理规定的。例如,中国的妇女就受到王权、族权、夫权等制约,人格不独立,依附于家庭和丈夫。而西方国家的民众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是独立的、自由的、平等的,这是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和法律明确予以规定的。受宗法伦理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中国人的公民意识相对薄弱,依附型、服从型的特征明显,独立性不够强,参与意识相对薄弱。而西方国家的公民独立性强,公民意识觉醒早,社会参与意识强。

从思维方式上看,中西差异也是明显的。中国人追求“道”,这种道原本指天地本原和规律,而实质上是某一时期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中国人更注重实用主义的价值追求,追求功利

的动机较强,从而形成对待事物的实用主义的政治态度和以“礼”而行的形式主义行为模式。而西方人“唯理”的思维方式,导致其价值追求的唯理论,即理性主义,重视抽象的思维方法。

三、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引发的思考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政治文化作用于政治体系的方方面面,影响政治体系的建立、运行、发展和变革。

其一,特定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制度)建立和存在的必要基础。特定的政治体系只能建立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只能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土壤中,照抄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证明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政治文化对特定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也有重要影响。因此,我们既要探索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和政治情感的制度体制,如国家领导力量的一元制、既重德治又重法治、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等思想;又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的要求,不断优化政治体制,完善政治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其三,政治文化影响政治体系的运作,制约着政治体系的变革和发展。因此,我们应搞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乃至超前的先进的政治文化。先进的政

治文化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靠掌握先进思想的组织和群众去主动建设才能形成。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吸收和借鉴外来政治文化的先进成分,以实现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引领世界未来。

“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在民族复兴的泱泱大风和世界竞争不断加剧的现代化大潮中,我们既不能僵硬地坚持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文化,而是应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现代性开掘,做到古为今用;合理吸收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做到洋为中用。惟有如此,才能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乃至超前的新型的政治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 [2] 徐大同,高健. 中西传统文化比较研究[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
- [3]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2.
- [4] 拉维奇. 美国读本[M]. 陈凯,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5:4.
- [5]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3.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115.
- [7] 林语堂. 中国人[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67.
- [8] 全元浦.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1-118.